

引 言

说不尽的中国陶瓷

人类的生存发展与陶瓷息息相关，日常生活中到处是陶瓷的身影。——从古到今，还没有一种人工制造的器物像陶瓷那样与人类构成如此广泛而密切的关系。

陶瓷古老而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就已出现，它是人类最早的文明成果之一，是远古先民富有创造性的见证；而瓷器在中国的商代已经萌芽，在汉代则已成熟。说陶瓷年轻，是因为直到今天它还与我们朝夕相处，还不断地花样翻新，丰富和美化着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给我们以特殊的艺术享受。——似乎还没有别的器物有如此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陶瓷高雅而又朴素。它被陈设在博物馆里，安置于大雅之堂，它是那样富于美的气质，卓然不群；但它又是最通俗的，朴素到日常生活处处可见，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它。——还没有哪种器物竟然把高雅与通俗结合得如此和谐自然。

陶瓷“卑贱”而又高贵。普通陶瓷联系着普通人的生存，自古以来它就与人的吃喝拉撒等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发生着联系，它

价廉到几乎人人可以拥有；但是陶瓷珍品却价值连城，甚至可以是无价之宝，以至于其赝品、仿制品屡禁不止。——似乎也没有同一类器物在高贵与卑贱之间形成如此大的反差。

陶瓷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人类依照自己的需要，任意捏塑和把玩手中的泥土，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陶瓷来制作，以满足自己不断发展的种种需要。人类不仅仅满足于陶瓷的实用价值，还把它作为审美对象，作为装饰陈设品，在陶瓷艺术品中积淀着美学情趣，在陶瓷工艺中淋漓尽致地发挥着艺术想象性和创造性。陶瓷以它无可代替的风姿和品格在艺术园地里占有一席之地，并沟通着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似乎也没有哪一样器物将实用与审美融合得如此完美。

陶瓷在时间的维度上联系着远古与现在，在空间维度上沟通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人们的共同情趣和审美心理，它是一种“世界语”。

陶瓷甚至沟通着现世与来世，人间与阴间。陶器中的明器（即冥器）似乎告诉人们，陶瓷对人而言，不仅与“生”俱来，而且与“死”相存，陶瓷于是有了超现实的象征意义。

陶瓷作为集实用与艺术于一体的特殊物品，作为审美对象，它以独特方式提供了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了材料、工艺、技术等等物质生产方面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人的精神、文化方面的信息，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有着审美情趣、时代风尚的熔铸。

陶瓷是“五行”之艺，金、木、水、火、土，缺一不能制成精美的陶瓷品。

陶瓷不是中国独有的器物，但在世界上，中国是较早发明了陶器又最早发明了瓷器的国度，是最充分地发展了陶瓷艺术的国度。所以，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之源的回溯，不能离开对中国陶瓷的重新观照。

中国是陶瓷王国，中国也将陶瓷推进了艺术的王国。在步入这个“王国”之前，我们且看看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康熙珐琅彩牡丹碗给一位观赏者的感受：“碗造型幽雅，胎薄而坚质；釉润而光滑，彩绘鲜明而绚丽，用以补色地的明黄彩纯净细润无一丝杂质；没骨花卉绘画风格工致细腻，娇艳端庄，各色牡丹花盛开时花朵的阴阳向背，花重茎轻的视觉感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同画家在宣纸上的绘画作品一样，有着极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种为花传神的高度技法，不禁使人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欣赏这件上等的陶瓷艺术品就像读一首好诗，看一幅好画，喝一口香醇的美酒一样令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

如诗，如画，如美酒，如窈窕淑女风姿绰约；类玉，类银，类冰雪，类青山翠峰清秀挺拔……中国陶瓷给人的艺术感受是难以言说的，更是难以言尽的。让我们打开陶瓷艺术之门，去接近她，去领略她的百态千姿、万般风情，也许她的美感会使你流连忘返……

王健华：《康熙珐琅彩碗辨伪》载香港《中国文物世界》第 83 期，1992 年 7 月号。

第一章

中国陶瓷与中华文明

中国陶瓷与中华文明有着广泛深刻而且极为独特的密切关系。泱泱中华古国，最初经瓷器“使者”为世界所知，文明昌盛的中国形象，起先以瓷器为媒向世人展示，以至于 China（瓷器）成为中国的象征和代名词。仅此一点，足以说明陶瓷与中华古代文明的特殊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陶器和瓷器的诞生、发展和流变过程的现象背后，反映着中华文明发祥、发展的足迹，标志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前进的步伐；同时，由陶器器形和纹饰流变所体现的陶瓷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状况，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过程的一种特殊记载。陶瓷器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是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普通器物，又是特殊场合的特殊道具，从原始巫术、图腾崇拜到进入文明时代的陪葬、祭祀和宗教活动，陶瓷被作为神器、礼器和明（冥）器使用。这些器物如今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它们的被发掘，一次次地证明甚至局部地改写着中华古代文明史。

中国陶瓷，只有置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宏阔背景上，才能品味

出它独特的艺术韵味。

第一节 陶瓷概说

“陶瓷”是“陶器”与“瓷器”的统称。“陶”“瓷”并称反映了这两类器物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广义上说，陶瓷包括陶器、瓷器、炆器（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的一种陶瓷制品，如水缸等）。陶瓷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工艺美术、环境陈设、建筑装饰等方面，现代陶瓷还在化工、电力、机械等工业领域有很大用途。此外，用粘土以外的其他原料，依陶瓷制造的工艺方法制成的制品，也叫做陶瓷，如块滑石瓷、金属陶瓷、电容器陶瓷、磁性瓷等，它们应用于无线电、原子能、火箭、半导体工业等等。作为艺术对象的陶瓷，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的陶瓷器物和陈设工艺陶瓷等。

陶瓷品类繁多，造型千姿百态，功用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对其分类，可以从质地、造型、功用等不同方面进行。

若以功用来区分，研究者一般将它分为实用陶瓷器、陈设陶瓷器、陶瓷明器、陶瓷玩具、陶瓷礼器及建筑陶瓷等等。

1. 实用陶瓷器。实用陶瓷是日常生活中实用的陶瓷器具。有食器（食用或与食相关的器物），如碗、钵、釜、鼎、灶等；有盛器，如簋、豆、盘、碟等；有贮器，如罐、坛、缸等；有饮器，如杯、尊、壶、盏、盅等；有服御器（即为人们日常起居及美化环境服务的器物），如熏炉、唾壶、烛台、虎子、化妆盒、各种瓶等；还有陶瓷文具、乐器等等。正是在这些日常用品中，体现出极为丰富的艺术趣味，其造型的变化多端，别出心裁，其纹饰的多样繁复，细微曲折，绝不亚于其他艺术门类中所体现出的人的艺术创造精神。如以食器中人们最为常见的碗来说，从最

早粗陋的半圆陶碗出现，几千年来，在没有改变其基本轮廓的基础上，有了数不清的细微的变化。不算陶碗，仅以瓷碗来说，其变化多端就令人叹为观止。有研究者按其特征将之分为平底、折腹、壁形底、撇口、荷叶口、海棠口、四出口、八出口、金（银）口、圈足、翻口、高足圈、葵瓣口、斗篱形、瓜棱腹、扇形、莲蓬、折腰、敛口、墩式、鸡心、卧足、高柄、草帽、脱胎、素胎、菊瓣、莲花、带盖等形状。^① 仅瓷碗就有如此之多的造型，其他器物依此推论，由其具体功用和审美需要决定，种类之繁就可想而知了。

2. 陈设陶瓷器。陈设器主要是用于生活环境的美化、装点、陈列的陶瓷器物，属于陶瓷工艺品，如陶瓷塑像，各种动物、植物、人物、神话形象的造型，花瓶，花插，屏风，还有专门的艺术瓷盘等。这些器物，每一种类可以说都在造型和纹饰方面千变万化，其具体种类难以计数。有的陈设器又与陶瓷玩具是一致的，既可以把玩、品味，又可以作为摆设观赏。这种功用特点至今没有改变，在陈设陶瓷器中，呈现着明确的艺术功用和审美追求。

与之接近的还有其他陶瓷工艺品，如陶瓷壁画、陶瓷建筑装饰等。建筑陶瓷也具有艺术性和文化意蕴，如秦砖、汉瓦和瓦当等。中国历史上的汉画像砖、瓦当，就是重要的艺术品。

3. 陶瓷明器。明器，即神明之器，又称“冥器”，也就是陪葬品。明器中，大部分与现实中所用陶器是一致的，还有一部分则是专为冥世所制作的。具体来说，明器中有各种“实用”器、模型、俑类、墓志、敛骨具等。明器无疑有着象征含义，反映着丧葬观念习俗的变化。

4. 陶瓷俑。俑本接近明器，它是古代丧葬的偶像，但鉴于

它用途较为单一具体而又数量多、种类繁，故把它单作为一类来看。俑有木制的，也有石雕的，但陶瓷俑是俑中数量极大而又最重要的。俑在我国东周墓中出现渐多，秦始皇兵马俑可以说是陶俑的极致。在汉代至唐代，陶俑仍盛行。宋代以后，因纸冥器流行，木俑和陶俑在一般的墓中逐渐减少。陶俑依其用途来说，大量的的是现世生活的“再现”，还有一部分是镇邪之物，如厌胜物。就前一类说，有男女奴仆、仪仗队等等，如胡俑、跪拜俑、伏听俑、立俑、蹲俑、箕坐俑、炊事俑、磨坊俑、杂技乐舞俑、方士俑、牵马俑、男女坐俑、孩儿俑、文吏俑、男女侍俑、老人俑、骑马俑、持盾勇士俑、甲骑武士俑、供养俑等等；除人俑外，陶俑也包括部分动物造型及变形俑，如人首蛇身俑、人首龙身俑、人首鱼身俑、人首鸟身俑、方相俑、镇墓兽俑、十二生肖俑等等，还有瓷质骆驼、马、牛、鸡、犬等等。^①从陶俑可见当时的生活习俗、服饰及雕塑艺术水平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研究价值。

5. 礼器祭器及宗教用器。宗教陶瓷器既表现在造型上，也往往表现于纹样、文字的装饰，如佛教、道教等仪规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有所表现。而早期陶器中，有许多造型和特殊纹饰，如“鸛鱼石斧图”、“人面鱼纹图”等等有着神秘的宗教色彩，它们可能是用于原始宗教活动的器物。原始宗教用途消失之后，它们就成为极为独特的艺术品。

陶瓷原本不是“为艺术”而创造，而是“为实用”所发明，陶瓷的艺术性与实用性开始是完全一致的，后来逐渐有了较纯粹的日用陶瓷与陈设陶瓷的区分，也就有了有意识地为艺术的陶瓷和为实用的陶瓷的区别。所以最初的陶瓷不是艺术品，但是陶瓷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却具有了艺术性。不仅如此，陶瓷艺术还是

小鹿（编著）：《古代陶瓷》，第10页。

人类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艺术门类之一。当然，即使是实用陶瓷，也尽可能地使之赏心悦目，使之带有艺术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陶瓷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始终是不可分的。陶瓷制品能把艺术与实用结合得如此紧密，是与陶瓷的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艺相关的，其可塑性决定了它的价值的多种可能性。所以，为了说明“作为艺术的陶瓷”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何为“陶”“瓷”器。

先说陶器。

陶器，是用陶土加水，和成泥，经成形、干燥、烧制而成的器物。陶土是多种粉状物和矿物的集合体，主要是沉积土、红土、黑土等，有的加石英等原料。陶器因胎料不同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一般质地较粗且不透明，可上釉或不上釉。陶器按粘土所含杂质及成分的不同和烧制温度的差别，呈白、青、褐、棕、黑等颜色。最初的陶器是为满足生活和生产活动的需要而制作的，所以没有花纹装饰。后来，随着陶器使用范围的扩大和器形的变化，逐渐出现了有意识地进行装饰的陶器，如彩陶；也在不同的地域出现了具有新的质地色泽的陶器，如黑陶、蛋壳陶等等。

古代陶器按其用途，大致包括了庖厨用具、建筑装饰、丧葬用品、文房陈设，早期陶器可能还有专门用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祭祀活动及族徽标识等精神方面需要的器物。

陶器，是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物质的结构和性质而创造出的一种新的器物，它不同于石器、骨器、木器等人类早期发明的工具。其他早期工具是人类在不改变物质特性的基础上对物质的改造利用，而陶器则通过对泥土的烧制，使之产生化学变化，而创造出一种新型物质来为人服务。

陶器的发明，同时也表明人类对火的利用的进展。弗洛伊德在追溯文明起源时，曾经讲道：“我们发现文明的最初行动是使用工具、控制火和建造住房。在这些成就中，对火的控制尤为突

出，是一项非同凡响和前所未有的成就。”^① 可以想象，在人类最初用火烧制陶器的时候，先民们并不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巨大的无法估量的意义，但他们从将泥土变成自己所需要的器形，将易碎的泥坯经熊熊烈火变成坚固的器具的过程中，一定体会到了创造的乐趣并增强了对未来的信心，制陶过程因此也许可以看作人类早期最重要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表明，由制陶业对窑炉高温的追求导致了金属器的诞生，随之有了反映早期礼制的玉器制作，它们留下了进入文明社会的足迹，所以陶器又是人类迈向文明门槛的见证。

随着社会的进步，陶器的工艺水平和陶器的功能也在不断发展，但陶器的基本特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也未被其他器物所取代而消亡，这表明，陶器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再说瓷器。

瓷器是在陶器发展的基础之上发明的。关于陶器与瓷器的渊源关系，有研究者如是说：“考陶器之兴，远在人类进于文明之前。在野蛮时代，即能制陶。……其后因文明之进展，陶器制造代有进步。唐虞三代以迄秦汉，无不以陶器为民生要事。……至汉时发明釉料，始有将陶器之表面饰以釉者。因外观之与陶不同，遂不名陶，而曰瓷。”^② 而“瓷”字也创于汉代。这大致勾画的是陶瓷演变过程，说明陶瓷的渊源关系，但这里的“瓷”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瓷，而是“原始瓷”。现在一般认为，原始瓷出现在商周，而到东汉时期，才摆脱了原始状态，出现了接近现代瓷器水平的瓷器。

陶器和瓷器都是通过人的创造性劳动，把泥土变成为“器”，因此有共同的基础。瓷器与陶器相同的方面主要在于：第一，其

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 页。

^② 赵汝珍编述、石山人标点：《古玩指南全编》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0 页。

基本工艺是相似的。它沿袭并发展了陶器制作的基本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瓷器和陶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没有陶器，就没有瓷器。第二，陶器与瓷器的用途是大致相似的。陶器在前，瓷器在后，如前所说，中国陶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而瓷器大约出现在商周，陶器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但瓷器出现以后，陶器与瓷器的发展并不是以后者代替前者，而是两者并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各自以其优势共同适应着社会的变化发展，满足着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直至今日，陶瓷并存的现象还在继续。

陶器和瓷器相异的方面在于：一是其所用的原料不同。陶器的胎料是普通的黏土，瓷器的胎料主要是瓷土即高岭土。陶器胚胎的含铁量一般在 3% 以上，瓷器胚胎的含铁量一般在 3% 以下。二是与原料相关，陶器和瓷器在烧制过程中的火候不同。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 900 度左右，最多达到 1000 度左右；而瓷器则是经过 1200 度以上的高温烧成的。陶器的原料不能经受瓷器所能经受的高温，否则就会融化或变形而烧坏，而瓷器原料则不怕高温，若不能达到这样的高温就不能烧结成瓷器。另外，陶器不施釉或施低温釉，瓷器则要施釉。陶器由于胎质粗松，断面吸水率高，比如已知最早的黑陶即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夹碳黑陶，其吸水率高达 18% - 25% ，而瓷器经过高温焙烧，胎体坚固致密，断面基本不吸水，如果敲击能发出类似金属的声音。还有，陶器和瓷器在功用上也有许多很不相同的方面，瓷器较陶器用途更为广泛。

陶器与瓷器的相继发明并不断发展，标志着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重大进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陶瓷都是与人类生存发展最为密切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它的演变过程中熔铸进了

高岭土是瓷器的主要原料，因最初在江西浮梁（今景德镇）东乡高岭村发现而得名。这是一种主要由高岭石组成的、白中微带灰色或黄色的黏土

历史前进的足迹和人性解放的烙印，直至今日，陶瓷仍然伴随着我们的生活。

第二节 陶瓷起源

中国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是中国远古先民的重大发明，是继石器出现后我国最重要的和最丰富的文化遗存。“中国制造之品，惟陶法发明最早。神农始作瓦器，见于《周书》；尧舜循行东夷，改良陶法，夏桀用昆吾而造屋；周礼重陶法而设官；秦则有缶量；汉则有砖瓦；列国则有器具；六朝则有土俑；隋唐则有佛像及杂物；至五代之末，磁器发明，而陶法遂浸进步矣。历宋迄清，相沿未改，此古陶源流之大概也。”^①

那么，陶器是怎样起源的呢？

陶瓷起源还是一个众说不一的谜，而有关陶器的神话传说，则使陶器的起源染上了神秘的色彩并表明其古老的性质。

由于陶器在远古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人们对它的依赖性，以及陶器特别是彩陶中浓郁的神秘色彩，所以，在上古时代，便产生了许多关于陶器发明的神话传说，后世文献对之有简短的记载。如，《吕氏春秋》：“黄帝有陶正 昆吾作陶。”《周礼·考工记》：“有虞氏上 尚 陶。”《逸周书》：“神农作瓦器。”《史记》：“黄帝命宁封为陶正。”《路史》：“燧人氏范金合土为釜。”《物原》：“神农作壘 軒轅作碗碟。”还有“神农耕而作陶”、“舜陶于河滨”等传说。

这里提到的黄帝、神农、燧人氏、虞、舜、宁封子都是中国神话传说人物，他们并不专司陶职，但是他们与制陶有着联系。

赵汝珍编述、石山人标点：《古玩指南全编》，第 377 页。

《周书》中说：“神农之时 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 作陶冶斧斤，……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神农为民作陶，教民播种，又尝百草为民治病。他是农神与医药神，又是陶神。舜也是传说中的著名人物，是上古五帝之一。《史记》中说他“耕于历山 渔雷泽 陶河滨 作什器寿 就时于负夏”。上文提到的昆吾，是夏的同盟部落，在今河南许昌东，善于制造陶器和铸造铜器，传说夏启曾命人在昆吾铸鼎。

在与作陶相关的神话传说中，关于宁封子的故事较为完整。

《列仙传》卷上记载：“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再于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焉。”宁封子为陶献身的精神十分感人，他的传说或许可以看作远古先民制作陶器过程中呕心沥血、将生命注入其中的一个曲折反映。后来在民间还有关于他的另外的传说，一个传说类似于前面引述的记载，说宁封为黄帝陶正，有一次在窑中架火烧陶，宁封上到窑顶添柴，不料窑已烧空，窑顶柴忽然塌下，宁封葬身火窟。人见烟灰中有宁封形影，随烟气冉冉上升，便说宁封火化登仙而不死。另一种传说，说的是在四川灌县青城山建福宫后有座丈人山，古时洪水泛滥，人民居住在洞穴，每次要到山下取水，可是没有盛水的器具，就以山下的润湿泥土为器具，所以容易破碎。一次偶然烧野兽，宁封从火中得到硬泥，于是他悟出了作陶器的道理。^① 这后一个传说，不但赞扬了宁封对陶器制作的贡献，而且，就陶瓷史来说，这个传说对于陶器的起源无疑有重要的发生学的启迪意义。因为，关于陶器的起源有着种种不同的推测，而关于宁封悟出其中道理的传说有一定的可信度。

如果说，神话传说把作陶的始祖归附于神仙或圣人身上，只是对古老陶器的起源作了想象性的解释的话，那么，大量出土的陶器遗存则为我们了解陶瓷的历史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关于陶器的真正的起源，只有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去寻找。虽然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只陶器诞生的缘由和经过，但是考古发掘的陶器遗存提供了研究和推测的基础。

（一）陶器的出现与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条件的关系。

首先，一般认为，陶器的出现与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关。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和渔猎为生，属“攫取性经济”，到了新石器时代有了农业和家畜饲养业。而陶器首先是一种实用器物，它在农业产生后，为了适应炊煮谷物性食物的需要和贮存的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经济已从火耕农业发展到锄耕农业阶段，作为陶器主要生产地的黄河流域已普遍种植粟和水稻。新石器时代晚期，除黄河、长江流域外，华南地区和太湖流域的锄耕农业也已有较大发展。农业的发达，是陶器需要的主要原因。与之形成比照，北方沙漠草原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经济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渔猎经济则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些地区的陶器明显少于黄河、长江等流域。这就是说，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和陶器的生产状况成正比，农业的发展是陶器产生的重要因素似乎可以肯定。当然，对此也有研究者持不同看法，认为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新石器早期遗存中，就有出土的陶器，而这时农业尚不发达，因此提出：“过去在考古界所流行的‘先有农业，后才发明陶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陶器的发明适应人类饮食生活的需要，在农业发明以前，我们的祖先早就发明和使用陶器了。”^① 笔者认

为，相对而言，石器与狩猎生活关系大一些，陶器与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关系大一些，这似乎是合乎情理和实际的。如果不是农业的发展直接导致陶器产生的话，至少也是导致陶器产生和促进陶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对于狩猎、游牧生活，农业的确与陶器关系更大。上述两种看法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肯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及其这种需要的不断发展，是陶瓷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

其次，定居生活也是陶器发展的重要原因。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狩猎为主，过着游动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第一是不十分需要陶器，第二是难以在游动中制造陶器和搬运陶器。新石器时代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人类定居成为一种主要的生活方式。1997年在河北省保定发掘的原始文化遗址，距今约一万年，这是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发掘表明当时先民已定居，并有家畜饲养，而在发掘出的遗物中就有陶片。这说明定居与陶器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陶器的产生与人类生产技术提高的关系。

陶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直接产物，是原始先民经过长期实践所取得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成果。原始先民经过长期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对于生存条件有了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客观上有了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一定的技术方面的条件。陶器从制坯到烧制成形，需要一定制陶技术、火候的掌握，而后来出现的其中带有各种色彩及纹饰的陶器，则还需要刻划描绘技巧。

制陶业经过了从手制到轮制的过程。制陶先制坯，制坯的技能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前期主要为手制。手制有捏制法、泥片贴筑法、泥条盘筑法等。据推测，早期陶器产生于以妇女为主体的母系社会，当时，陶器的制作主要是由妇女来担负。比较小

的陶器用手捏成，体大的陶器以条泥盘筑成型，即先把陶泥搓成泥条，一圈一圈围起来，再将里外壁抹平，制成坯形，这称为“泥条盘筑法”。这种手制的陶胎较厚，也不均匀，器形不规整。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出现了轮制。轮制是指用一种特制的轮盘制作器物，轮盘就是“工作台面”。轮盘的转动带动陶泥的旋转，制作者按照要求造型。制陶进入轮制法阶段，男子参与制陶，随后成为快轮制陶的主力。仰韶文化中期成型技术已有所进步，开始采用在转动的圆形木盘上（陶轮）盘筑坯形后修正坯体的口沿，称之为“慢轮修整”。到大汶口文化晚期，进一步发展为把陶泥放在快速转动的陶轮上提拉成型，出现了真正的“轮制”。用这种方法制作的陶器，薄厚均匀，坯体内壁留有细密的平行旋纹，器体上有用线拉割的偏心纹。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轮制已普遍使用。这种带有一定的机械性质的制陶方法一直得到延续。轮制陶器的特点是：器形规整浑圆，胎壁变薄，造型美观。从陶器特别是彩陶的形体中可以看出制陶技术和工具水平的发展。陶器制作工艺的这些方面反映了新石器时代先民曾经在陶器制作中表现出的创造性。

由于陶器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易于破碎，因此更新频繁。而正是这种原因，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制陶技艺的进步所留下的工艺、形制、纹样以及发展更新的遗迹，它不仅足以使考古学者排成序列作为度量年代先后的标尺，而且反映着我国原始人类的历史足迹。

（三）陶器产生的直接动因和主观因素。

前面说到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定居生活方式，是产生对陶器需求的现实基础，制陶工艺的创造和烧制技术的把握，是陶器得以制成的必要条件。然而在这之外，应该还有更为主要的内在的动因，直接触发了人类对于陶器的需求和创作冲动。需要本身就

是创造的动机，它是陶器起源的主体因素之一。

如前所说，也许人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第一个陶器是怎样诞生的。它可能是一种偶然的机使人们发现了泥土可以成型的精妙与奥秘，也许是某个先民独特的创造和发现而有了“第一个”陶器。这种偶然性是存在的。但是，不管如何偶然，它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生产、生活实践积累的结果和精神需求的反映。以前关于陶器最早制作的直接动因，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原始先民的编织技术早于陶器技艺，陶器的出现与之相关。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设想，先民们为了生活的需要，把黏土涂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使之能够耐火，以用于烧煮食物。后来，他们发现，用泥土可以直接成型，制作陶器，于是诞生了有意创造的陶器。这个看法是恩格斯在莫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的，后来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个看法当然也有猜测的成分，但仍较为合理。而且从陶器及陶器上的篮纹、绳纹等纹饰分析，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在这里，现实的需求和实践中的无意触发，制作的必然规律与偶然的灵感，都可能共同发生作用，促成了第一个陶器的诞生。

人类由最初无意间触发生产陶器的想法，到后来有意地进行大量的生产，这个过程肯定包含了人对于自己把握外物能力信心不断增强的过程，也包含着人从中逐步发现陶器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着人类的某些原初的普遍的本性和本能。比如，在将此物变为他物的变化中，触发了人的好奇心，激发了人的创造性，初步获得了掌握世界（模仿、复制、改造他物）的欣喜、快意和美感等等。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陶器需求的意识与对于陶器功能的发现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由把陶器作为一般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到逐步在陶器制作中赋予审美要素，作为欣赏的对象，进而赋予陶器象征意义，使之成为寓实用与艺术于一体的器物，我们应该认识到，人

类伟大的发现精神和创造精神，人类不断发展的精神需求，是促进陶器特别是彩陶发展的重要的动因。

（四）陶瓷装饰艺术的起源。

陶瓷的装饰是构成陶瓷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陶器装饰是刻划纹和印纹。就是在陶器胎体上刻划或压印出花纹，来达到美化陶器的目的。之后，则有用色彩绘出的线条、花纹和图案，即纹饰。瓷器诞生之后，沿用和发展了陶器的纹饰手法。

关于陶器装饰艺术的起源，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它产生于制陶工艺流程中。研究者推测，最早的刻划纹或印纹是陶工在器物成型的操作过程中，无意间留下的痕迹，这种印痕经烧制仍然保留在器物上。这种偶然间造成的现象，启发了制陶者，遂产生了美化陶体的意识，早期陶器上的绳纹、篮纹、席纹、附加堆纹等等，大体上用的是同样的手法。这就是说，制陶的实践过程，是催发陶器装饰产生的重要途径，也是启发人们产生装饰美化陶器意识的重要途径。这种意识一经产生，就反过来指导制陶实践，并不断地发展提高。

制陶工艺产生和催发装饰艺术的这种现象，曾被英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贡布里希举例来说明一些重要的艺术理论问题。他说：“举一个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基本艺术问题：陶罐上用等距排行的条纹装饰。不管人们是否假定了一种驱使手工艺人着手工作的主观的‘装饰陶罐’，手工艺人都必须服从客观实际，计算出行距之间的数据，算出这些数据间隔，直至这些装饰适合这个陶罐为止。一个较丰富的，覆盖范围较广的图案则相应地却要更多地注意其中包含的各种限制因素。不过，这种注意可能得到报酬，这个报酬就是在装饰因素之间无意地显现的新的关系的发现，而这些新关系本身可能会被利用和调整，在这个模式中很容易看到手艺人的感受如何能在简单的程序规则中明朗化，这些规